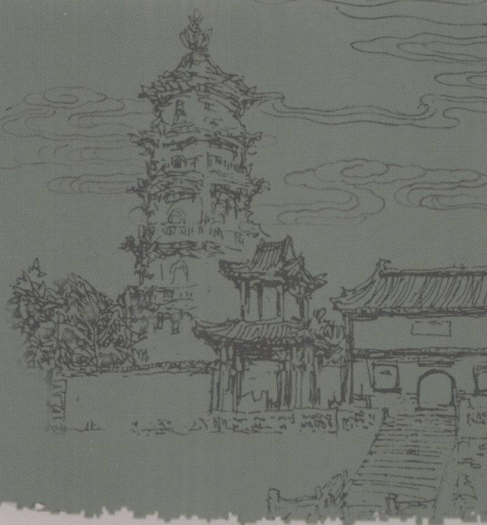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白化文  著

汉化佛教与佛寺



北京出版社

大家書

汉化佛教与佛寺

白化文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化佛教与佛寺 / 白化文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3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07691 - 2

I. 汉… II. 白… III. 佛教—通俗读物 IV. B9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416 号

责任编辑 韩敬群 莫常红
装帧设计 可格可弃
责任印制 宋 超

· 大家小书 ·

汉化佛教与佛寺

HANHUA FOJIAO YU FOSI

白化文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6 开本 15 印张 162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2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7691 - 2

B · 144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



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面向大众的佛教科普著作

周绍良

白化文同志在二十年前写了一批介绍汉化佛教的寺院与僧人生活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佛光的折射》一书，由香港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台湾中华书局在1990年出版重印本。内地有两种经过不同增补的本子，各自有自己的书名，应该视为另两种版本。

此次此书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新的改定本，新版附丽于一套丛书中，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书，均有介绍性前言。由于我和佛教界及作者均有密切关系，作者和出版者都希望我为此书写一篇前言。谊不容辞，我乐于从命。

白化文同志认我为“本师”。这是个佛教专名词，原意指的是“最根本的教师”，特指释迦牟尼佛。后来，中国的汉化佛教有“三师”，即授业师、法幢师和本师，本师特指嗣法之师。再往后，佛门弟子尊称传学之师也称本师。我想，他以如此尊称对我，是因为他在大学读书以及毕业以后，和别的老师关系都比较一般。在我这里算是“登堂入室”了。他的另外的几位老师，他认为“授业师”的，有周祖谟、吴小如等位先生；在他提职称时做过推荐的，如季羨林、顾廷龙、周一良、宿白等位先生，他认为“荐卷师”。当然，他对于这



些位老师，都是极为尊敬的。可是，大体上都不如我们之间亲切。我最近读到白化文同志为庆祝中华书局九十周年大庆写的一篇文章，即《一以贯之地培养作者》，其中提到一些我和他的关系，以及此书的写作缘由与经过，颇能说明有关的问题，无妨引用：

“文革”羯鼓声高，和弦音寂。1972年左右，长沙不久留才子，中华书局群公陆续自咸宁五七干校北还。约1975年，邓公复出，知识分子又有复苏之感。忽一日，中华召集二十余位中青年人，在新址王府井大街三十六号大楼二层南头大房间（此房间不久成为文学编辑室所在）开会。实际主持人是褚斌杰大学长。会上散发一份选题选目，说要出一套“知识丛书”类型的小丛书，让大家自认题目。我认为，按当前形势，这套书出不来，即使出几本，也是批判对象，说不定给作者和编者惹出多大麻烦来。因而极为消极，坐在远离褚爷（尊称，由京剧中褚彪的尊称引申）的西南角落里，一言不发。将近散会（当时无招待吃饭一说，更有粮票问题，故临近饭时必须散会），捧场领任务者寥寥。褚爷有点着急，隔着长桌子远远地冲我一指：“老白，‘敦煌俗文学’这个选题归你写了！”这一指，决定了我后半生业务的努力大方向。

原来，程毅中学长和我在大学时期经常一起读书，有一段时候，以郑振铎先生巨著《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心，共同钻研俗文学。这一点，大约仲弘学长向金灿然先生介绍过，所以召见时有所垂询。褚爷可能早有所知。

其实，程先生后来深入斯学，写下极富创见的有关变文的论文。我则旧业早已抛荒，拾不起来了。

不久，“四人帮”倒台，大地复苏。中华可就催稿啦。当时尚在《文物》杂志编辑部服务的沈玉成学长见我转磨，就带我去谒见斯学泰斗周绍良先生。从此，我拜周先生为师，学起敦煌学来了。那时，这条道路上路静人稀。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聪明最要强的，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条件，如能坐下来，少干扰，创造些获取相关资料的机会，即使条件比国际上同行差得多，他们也会毫无怨尤地自动干将起来。……现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早已居世界前列，我则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非常落后了，只能有时混在敦煌学界，打打杂而已。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新著如林，读后自惭形秽，自然噤若寒蝉矣。派我写的小册子始终也没写成，愧对中华和程、褚诸大学长。不过，这一指影响甚至决定了我后半生的业务走向，却是肯定无疑的了。

.....

《文史知识》的文风要求是深入浅出，说理透豁，又得让高中程度以上的老中青读者全能读懂并爱看。在写稿过程中，我力求一以贯之。久而久之，似乎成为一名编写“社科科普”文章的作者了。应该说，在为《文史知识》写稿前，我写稿不多，公开发表者更少。《文史知识》把我培养成一个尚能动笔的人。而且，一种杂志铸成一个人的文风，起码是表现在我身上了。

《文史知识》还培养我进入了两门学术领域。一门是对汉化佛教的佛寺、佛像、法器服饰等方面的介绍性



阐释，这是与旅游之风兴起有关联的。我师从周绍良先生，周先生那时已经由被迫家居而逐步东山再起，进入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了。我以近水楼台之便，得以经常出入庙门，就近研究。后来写出一批通俗性介绍汉化佛教的文章，并结集出版。这却是以自学为主的，出入寺院为我提供了直接的具体的素材。太老师周叔迦老先生的著作成为我规抚的蓝本。

其实，我与白化文同志并非授课那样的师生关系，不过有时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有点类似博士生和导师在客厅里闲谈罢了。我们还一起编纂过两本书，即《敦煌变文论文录》和《敦煌变文集补编》。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与敦煌学特别是敦煌俗文学相关的问题，编纂的也是敦煌俗文学方面的书。约三十年来一贯如此。与佛寺等相关的事，我与他交流极少。但是，我父亲周叔迦老居士是一位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注意向大众普及佛教知识的人，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近现代“佛教社科科普”的先驱者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与这方面有关的文章，后来结集成《法苑谈丛》一书。此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颇为流行，中华书局并改易书名为《佛教基本知识》，作为《文史知识文库》之一种出版。白化文同志所“规抚”的，就是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社会和学术发展都很快，现在看来，《法苑谈丛》已经带有古典性质。白化文同志是一位善于学习的人，他虽然参考了《法苑谈丛》，却是很有发展的。一方面，从行文看，真正做到如某些友人赞誉的“如行云流水”的水平，是一篇篇相当漂亮的“社科科普”创作，深入浅出，让人一看就明白，让人爱看。另一方面，

从内容看，他在承袭后又有许多发展，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明显地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领会与心得。例如，佛寺与佛殿平面示意图，就是他的创造。他虽然埋怨别人直接抄袭他的文章，可是，示意图却是没人敢照搬的。再如，对汉化的诸天的阐释，在他以前也没有谁说得那样浅明透彻。总之，他的“佛教科普”文章，都是极有个人特色的，有自己的新意的。

白化文同志对中原一带汉族为主的佛教派系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逐渐汉化即本土化了的佛教，他特称之为“汉化佛教”。他认为，一方面，汉化佛教逐渐本土化，早已孳生成佛教派系中最大的一支，具有自身的极大特色。汉化佛教乃是原始佛教在中国的折射罢了。另一方面，汉化佛教又影响到国外，特别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及东南亚北部的越南等地区。当然，这些地区的佛教，在传入之后又都有自己的某些发展，但都带有明显的汉化佛教特色。这是白化文同志研究佛教形成的一种主导思想，在此书中贯彻始终。

我与中国佛教界关系密切。中国佛教界从传承的角度，将中国佛教的派系划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系。“汉传”与“汉化”仅一字之差，却说明与白化文同志的着眼点不同，虽然并不冲突，却是应该提出来的。

白化文同志写作此书的前前后后，我虽然都亲眼得见，可从来没有参与其事，更谈不到给他什么帮助了。此书出版后，我的堂兄周一良却是比较仔细地阅读过，并且提出若干中肯的意见。比如，从梵文推阐“南无”的含义与用法；阐明观世音菩萨崇拜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盛行，而不是像白化文



同志原来从旧说那样，认为唐代始盛。这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观世音经”等条目中曾有过阐释的。化文向来从善，在内地版中改正了。这次新版，听说又有一些更动。我总是在想，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前进实在太快。我父亲那本书已成古典。化文这本书，不论从行文上看还是从内容方面看，较之当代流行作品，也有点老态啦。它大致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与文风。就让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佛教“社科科普”的代表作品，再现在读者面前吧。

2002年8月23日 京郊双旭花园

出版说明

白化文

有关这本书的源流和特点等情况，本师周绍良先生在新版前言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我想补充的不多，大略有如下几点：

一点是，这本书中的一部分篇章，原来是对着《文史知识》的口径编写的，力求能达到深入浅出。是否做到了，不敢说，但我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后来续写的一些文章，也与这样的写法一致，慢慢地形成了我个人的文风。细心的读者若是赏脸常读在下写的这些东西，当可逐渐体会到，不论优劣成败，这种文风自有其特色，起码，文气是前后贯串的，读起来顺畅。这是从行文看。从内容看呢，我也力求在吸收先辈留下的滋养时，在每一篇章中加进一些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不过分地当文抄公，竭力避免人云亦云。

接下来的另一点则是，我从来爱当垦荒者，爱走路静人稀的荒野小径。一条道上走的人多了，我就慢慢地改走别的路线。在我写这本书中一些篇章的时候，时当20世纪80年代初，旅游热刚刚兴起，介绍汉化佛寺与僧人的书籍不多。后来，大家一拥而上，我就慢慢地转移阵地啦。可是，晚出的相关著作，常有借鉴拙作之处。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事，还是赏我的脸呢。不过，连篇累牍地抄袭，就不敢恭维了。文抄公们比较聪明，抄几句就改换若干字词。殊不知，这样一来，



原来的文风就被破坏了，文气自然也就不连贯了。读起来，疙里疙瘩地不舒服。此次新版此书，带有立此存照之意。希望引起读者和参照者的注意：使用别人的资料，最好但师其意不师其辞，更要加上自己的新意，斯可称豪杰矣！

最后要说的与前述两点关联不大的一点是，这本书的的确确是一本“小书”。它的内容浅显，分量不大。但是，鄙人绝非“大家”。责任编辑韩敬群同志非要把此书编入一套丛书之中，在下力辞不获。他并且说，此书绝版数年，新版会有销路，云云。在下为了前面所说的原因，更为了捞点稿费，不避搭先贤的便车以抬高自己之谓，冒此大不韪。知我罪我，是在于读者矣！

新版略有增订，图片也多有改换。原香港版中，按惯例，在音译词语之后附加梵语拉丁字母转写的对音。此次新版，按责任编辑的意见办，大都删去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些对音用处不大，对阅读此书可说毫无影响。要是想查，找一本相关的辞典一查就行。总之，不论好坏，我算是把它又抛出来了，请广大读者彻底批判吧。

当然，我应该感谢北京出版社与印刷部门诸公，特别是责任编辑韩敬群同志。他们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快。我也必须感谢此次为此书制作图片光盘的乌心怡女士。没有他们，这本书的这次重版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出不了这么快。我谨向他们表示意重言轻的感谢。

最后，我认为，还是应该再次恳切地强调：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小书”，它只是附丽于这套丛书之中，作者绝非“大家”。

2002年9月11日 承泽园

目 录

一	佛光的折射	(1)
二	释尊的生涯	(7)
三	佛像与佛寺	(31)
四	山门与天王殿	(46)
五	大雄宝殿	(69)
六	菩萨	(99)
七	观世音菩萨	(112)
八	中国的罗汉	(129)
九	汉化的诸天	(141)
十	藏经与藏经阁	(167)
十一	塔与经幢	(177)
十二	受戒与戒坛	(188)
十三	僧人生活与佛事	(202)

一 佛光的折射

一种宗教，从形成到发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一定的教义，常以经典形式记载并传播。

（二）具体的崇拜（礼拜）对象，即“神”。此种对象常以具体形象显示。

（三）用适当方式（常为有层次的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相当数量的信徒。

（四）独有的活动场所、根据地。

宗教消亡后，信徒消逝，上举（一）、（二）、（四）等三项依然可以流传，作为历史资料与文物而存在。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时，释迦牟尼在南亚次大陆创立的。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世界认为是“无常”的，即迅速变化的和虚幻的。而现实人生则是“苦”的。“苦”的基本原因既不能怨天——不是神的安排；又不要尤人——不在社会环境。而是由于个人自己造出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自寻的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及其造成的结果。根据个人善恶行为，今生之因在未来成果，如此“轮回报应”，生死循环变化不已。要摆脱“苦”，就要皈依佛



法，按佛教教义修持，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观、认识观，完全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最后超出生死轮回，达到最高境界“涅槃”（也可说是“解脱”）。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完全具备宗教形成与发展的四项条件：

（一）它的教义，富于哲理性、学术性，吸收其他教派教义和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不少，传承发展中派系繁多；而且经典繁富，结集成“三藏”，即“大藏经”。

（二）它是逐渐形成的一种多神教系统，有“佛”、“菩萨”、“罗汉”、“诸天”、“鬼神”等一系列庞大复杂的崇拜对象，并以图像显示。因图像繁多并成为信徒主要膜拜对象，又被人称为“像教”。

（三）有用多层次的清规戒律严密组织起来的信徒“七众”。即，出家五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对各种信徒的要求宽严不同，接受的戒律不一。但加入组织时必须严格履行手续，即“受戒”。

（四）以佛寺为主要根据地。

佛教在发展中，由于对教义和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产生了许多教派。大致地说，较原始的佛教教派，被称为小乘佛教，以自利修罗汉果为最终目的；1世纪左右兴起的大乘佛教，则以利他修菩萨行成佛为最终目的。小乘只承认释迦牟尼一人是佛，大乘则认为大千世界有无数佛。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中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小乘、大乘、密教，这就是南亚次大陆佛教流行中形成的三大派系。

佛教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又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一

般地，在中国汉族地区形成，传入日本、朝鲜半岛等处的，称为北传佛教，又称汉化佛教。以大乘为主，其经典属汉文系统。在中国蒙藏地区形成的，称为藏传佛教，又名喇嘛教，是佛教（包含大量密教成分）和当地宗教“本教”的混合。其经典以藏文为主。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西南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其经典主要属巴利文系统。

佛教传入中土，大约通过三个途径。一个途径是通过中亚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这是一条最主要的道路，东来传法和西行求法的高僧常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因此在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中，被认为是唯一的道路，那当然是不准确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西南方边远地区传入。关于这条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有若干研究成果发表。学者们在研究了佛教在古代四川地区活动的情况和出土的汉代佛教遗物以后，对于佛教从川滇路线和古身毒道及青衣道等处传入，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上两条都是陆路。再一条是海路，从广州直到扬州和现在江苏、山东一带沿海地区，随着航海客商的往来传入。这是一条登陆口岸较多的海路，过去研究的也比较少。后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早期佛教造像被重新发现，才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它提示人们注意佛教早期从海路传来的可能性。

佛教大约在东汉时期已在中原和江南一带流行了。汉代的人很重视神仙方术，佛教初传，大约也被看作某种神仙方术。为了争取在中国扎根传播，佛教徒开始用汉文翻译佛典，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可以说，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朝着汉化的方向前进了。